



## 多元文化在徐州地域的汇聚与融合

王 健

徐州古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受到多元地域文化的冲击、陶冶和涵化，在本土东夷文化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宋文化、徐文化、齐鲁文化和楚越文化的丰富内容，并在汉代社会土壤之上不断孕育新的文化因子。经过复杂的选汰整合，逐渐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汉代亚区域文化，即相对成熟、定型的汉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打造了具有东方风韵的地域文化景观。

### 一、土著东夷文化时期

东夷文化是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古地域文化，它以古东夷族为创造主体，肇始于史前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龙山文化，消亡于春秋战国之际。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不同地方类型，徐州地区主要存在两种东夷文化的子系统——大彭氏族方国文化和徐夷方国文化。

徐夷文化经历了史前、三代方国和东周三个阶段的变迁，每阶段内涵包括特定器物群、生活习俗、原始宗教、礼乐之制和治国方略等各有不同，但又保持了相对稳定的自身特色。这些文化特质并没有随着大彭方国和徐国的衰落而消失，许多因素得以积淀下来，成为徐州汉代区域文化的重要渊源。

徐夷是东夷人的一个重要支系，可追溯到少昊和颛顼时代。《史记·秦本纪》提到徐夷人与秦人同姓同祖：“秦之先为嬴姓，其后





分封,以国为氏,有徐氏、郟氏、莒氏……秦氏。”徐氏即徐夷的先人。史家记载秦人后裔伯益时,提到:“伯益生若木,夏封之于徐,三十二世至偃王。”《太平寰宇记》说:“若木别为费氏,居南裔为诸侯,至夏代末年,其君费昌去夏归商。佐汤伐桀,有功入为卿士,汤封费氏之庶子于淮泗之间徐地,以奉伯益之祭祀,复命为伯,使主淮夷。”据此,商汤封费氏庶子于淮泗之间的徐地,成为东夷人中的一支,所以徐氏也被称为徐夷人或徐戎。

至商代,徐夷主要活动区尚在鲁南一带,邹县附近可能是伯夷之子若木的所封之徐。此后徐夷势力不断分化并逐渐南移,武王灭商后,周公旦封于少昊之墟曲阜为鲁公,在周公势力的压力下徐夷已迁至苏北地域。不久发生三叔武庚之乱,徐夷亦参与反周。周穆王时,徐偃王称雄于淮泗之地。《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

春秋时期,徐国疆域的核心区仍在淮河以北的泗洪和泗县一带。其东部有小国钟吾、淮夷小邦,北部邻邳、宋,西有钟离、宿、萧国等,南与吴国交界。文献中记载的徐王有偃王、驹王、义楚和章禹,出土金文记载的徐王有迁及、余冉、疾、余和庚等。春秋晚期(公元前512年),徐国为吴王阖闾所灭。

古徐夷文化在苏北夷人中率先步入文明时代。传世和出土的青铜徐器约有20余件,其中主要有徐王鼎、徐王义楚簋、徐太子伯辰鼎、徐王义楚剑等。20世纪80年代在江西一带有徐国铭文的铜器出土,如徐王义楚所作盥盘、徐令尹者旨型所作炉盘、徐王义楚之器及其它九件铜器。20世纪60年代在山西侯马上马村晋墓中,





出土来自徐国的两件同铭铜器《庚兒鼎》，可能作于鲁襄公时期，这些发现均令人对徐人生产力和工艺水平刮目相看。郭沫若认为中国古文化有南北二系，徐、楚王为南系中心，徐人直接继承了商文化，并对吴越文化产生了直接影响。李家和指出，高度发达的徐楚文化，在江淮一带和南方吴越乃至岭南地区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方面起过巨大而深远的作用。

徐夷作为淮夷大国，长期与王朝对抗，开创了不畏强御的反抗精神和尚武传统。随着周文化的传播，徐王改变尚武黷武传统，倡导以仁义治国，这些对后世有深远影响。苏秉琦指出：“徐夷、淮夷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这个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确有特色。”古彭族文化和徐夷文化作为土著文化遗产，给汉代徐州区域文化留下深刻的历史底色。

## 二、以商宋文化为主调的整合时期

在商代，古彭国是东部一大方伯，长期保存了商文化的很多习俗和精神传统。作为商族人的后裔，宋人在感情信仰和文化习俗的层面上与之十分相近。以人殉祭社的风俗为例，《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亦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又用诸淫昏之鬼，将以求霸，不亦难乎？得死为幸。’”杜预注云：“此水次有妖神，东夷皆社祠之，盖杀人而用祭。”又云：“临沂县东界次睢有大丛社，民谓之食人社，即此次睢之社。”在历史上，殷商的杀殉传统由来甚久，在殷墟商王大墓中曾有惊世的发现，这种习俗与先秦其它部族和区域文化相





比是非常突出的。20世纪50年代在铜山县邱湾发现商代杀人祭社的遗址,这种习俗与上面提到宋国春秋时的做法非常近似,两者间可相互为证。

还值得提到的是,宋陈地域道家文化对徐州地域的影响。老子本为陈人,后来徐沛定居治学,道家文化随之东传。东周时期宋国对徐土的统治,在这里广泛传播了宋文化。

应指出,自春秋中叶以来,以秦、三晋、楚、齐鲁等为代表的几大文化圈逐步形成,圈内的中小诸侯国的土著文化自身特质渐趋削弱,而缓慢涵化到较大的文化系统中,宋文化便是如此。随着楚势力北上东进,到战国后期宋文化逐渐向楚文化靠拢和认同。

### 三、以楚文化为主调的多元地域文化整合时期

这个时期开始于春秋中期,其下限可定在秦灭六国。楚文化本为长江中游区域文化,春秋势力迅速发展。春秋末年“楚东侵,广地至泗上”。战国中期楚国最盛,多次对宋鲁等国发动战争,“北绕颖泗,东裹郟邳”,兵锋直指徐土。战国末年楚重心东移江淮地区,先后灭宋灭鲁。公元前233年秦灭楚。

在楚国东渐的漫长过程中,楚文化也风靡于淮泗一带,与当地本土文化相互激荡。至战国末年,楚文化已成为江淮淮北地区的文化主流。学者指出:“楚文化的扩展,是东周时代的一件大事。春秋时期楚人问鼎中原,楚文化也向北延伸。到了战国之时,楚文化先是向南大大发展,随后由于楚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又向东扩张,进入长江下游以至今山东省境。”

通常说的三楚域分,也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从此彭城一带纳入西楚地域范围。关于三楚,存世文献中权威的说法来自于司马





迁,《史记·货殖列传》言:“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按照太史公的划分,南楚之地看来是以长江为分界的,但将南郡划到了西楚似未妥,不过彭城属于西楚却是没有疑问的。徐州一带是东楚与西楚的结合点,再往东至淮阴沿海是东楚,彭城及其西部一直到江汉之东为西楚。彭城虽位于西楚之边缘,但因项羽建都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在西汉人心目中就成为西楚象征地。三楚划分乃是战国政治版图的产物,在西汉时还相当盛行,但到东汉班固写《汉书·地理志》时已不再采用这类说法。

因此,徐州区域真正属楚版图不过 60 余年,但楚文化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这半个多世纪,起码要从春秋楚国出师争夺彭城事件(前 573 年)开始就发生较强的文化渗透,经过长达 3 个世纪的文化东渐,给当地留下楚风楚韵的文化烙印。

徐州古文化中的楚文化因素,首先反映在考古文物层面。迄今这里发现东周遗址和墓葬数量不多,但仍能反映出楚文化影响。如 1958 年在邳县刘林战国墓葬出土铜器有大鼎一件、方壶两件、簠两件,还有衔、勺、镂空甗和铜捧盒等。其中簠上有铭文,凡八字:“西替乍其妹斲钜(簠)。”西替,据尹焕章辨认,为西楚二字。从出土的铜簠的器形和铭文来看,与安徽寿县发现的标准楚器都颇为类似,铜器上的鱼鳞纹和折带纹具有楚文化的作风。1985 年在铜山吕梁乡凤凰山麓清理战国墓葬两座,出土器物有高足带耳的彩绘鼎,高圈足盖豆、三足鸟形尊、敞口高颈圜底折腹罐,鼎的彩绘图案为楚器所常见。

另外楚国的货币体系别具一格,对徐州地域影响很大。在沛县





栖山画像石汉墓的填土中,曾发现一枚殊布当釠的铜铸币,在清人《遗篋录》中也曾提到徐州出土过这种货币。该币应是吸纳三晋货币特点、结合楚币习惯而形成的。在邳州小冯园战国遗址中,出土过大量的楚国蚁鼻钱,在铜山高皇庙遗址的上层也出土过蚁鼻钱。在徐州还发现有楚郢爰,如1989年末在邳州房亭河水利工地曾出土郢爰金币一枚,分别钤印篆书“郢爰”二字。王毓铨曾把战国的宋国定为布币流行区,从目前发现来看,这里应是楚币流行区,当地很少发现魏、宋流行的布币。

在观念文化层面,楚文化则以道家思想和浪漫主义为典型特征,可在秦汉徐州文化中寻绎到积淀因素。比如,这里的道家黄老之学和社会思潮相当盛行,起事于丰沛的刘邦集团多有道家倾向;徐州汉画中的神话和祥禽瑞兽题材丰富,这类浪漫作风既有楚文化崇鬼崇神、重祭祀的巫风因子,亦包含滨海齐文化神仙方术风格。

楚文化对本地区的方言影响甚大。《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用《风俗通义》佚文称:“《汉书注》: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开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耳。”这则轶文证明,汉代徐沛方言仍带有楚方言成分。西汉人扬雄著《方言》的语言调查也表明,此地方言多与楚方言系统有关。该书第一、七和十一卷中,他三次提到了“西楚”方言区,提到“楚东海”之间、“青徐淮楚之间”的区划。

在风俗层面,刘邦所做的《大风歌》,每句都用“兮”字,这是典型楚辞文体的痕迹。他安慰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刘邦起兵后自称的沛公,是楚国县令的官名。《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引孟康曰:“陈涉为楚王,沛公起应涉,故从楚制,称曰公。”反秦





政权亦是采用楚官制,如曹参封号有执帛、执珪等。又如韩信亡楚归汉被封连敖,《汉书·韩信传》颜师古注引李奇曰:“楚官名。”《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隆虑侯周灶以连敖入汉。立国后刘邦又将楚文化因素传播到关中,并推向了全国。

在葬俗层面,徐州汉墓有明显的楚俗。徐州发现的西汉早期墓陶器组合均为鼎、盒、壶、钫,与中晚期的楚墓里常见仿铜礼器组合接近,继承关系相当明显。陶器中的彩绘鼎、盒、壶、钫的色彩、纹饰,与楚墓器物非常相近。铜器组合有鼎、壶、盘、钫、鉴,与战国晚期楚墓组合亦相似。再如北洞山楚王陵内大量的夹纆胎、木胎的漆器残件,有案、卮、耳杯,装饰有变形云纹及三角几何纹。狮子山楚王陵墓中的发现有漆木棺,虽已腐朽但从残漆皮中仍可看出原来的彩画图案。徐州汉墓漆器无论是器形、装饰图案还是制作方法,都继承了楚文化的漆器工艺传统。

须指出,即使在楚文化为主调覆盖徐州地域的阶段,其它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是明显的。自古徐州地接齐鲁,齐鲁文化的渗透也是有迹可寻的。在上面讲到的方言区域归属上,扬雄《方言》还分别讲到“青徐海岱之间”、“齐鲁青徐”、“周郑宋沛之间”、“江淮青徐之间”、“东齐青徐之间”、“荆扬青徐之间”和“徐鲁之间”等,提到“徐土邳圻之间”,反映徐州方言文化还受到齐、鲁等区域的强烈影响。

从《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来看,徐州东、西、南部所接受的文化影响源不同,造成徐土文化内部又有一定空间差异。战国秦汉时期的徐州一带,以彭城为分界而划分为东、西楚。《史记·货殖列传》云:“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南部之徐县、取虑和东部之东海郡、下邳等地,则风俗





近于淮夷，“徐、僮、取虑，则清刻，矜己诺”，“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太史公的记录反映了战国时代晚期的地域观念。班固则从春秋古国范围进行文化区划分，他将汉代之楚国和沛县等地隶属于古宋文化分野。《汉书·地理志》：“今之沛、梁、楚、……皆宋分也”，“今之楚彭城，本宋也”，“宋虽然灭，本大国，故自为分野”。班固强调鲁文化对泗水流域的影响：“鲁地，奎、娄之分野也。东至东海，南有泗水，至淮，得临淮之下相、睢陵、童、取虑，皆鲁分也。是以其民好学，尚礼义，重廉耻。”这些记载说明徐州地域文化的复杂面貌。

综上所述，在先秦到西汉的漫长时段中，来自不同地域背景的文化要素在古徐州区域汇聚、积淀和交融，与当地古老的土著文化传统产生互动式涵化，造就了汉代徐州地域文化的独特气质和风貌，使之成为带有过渡性和边际性的亚文化区，在众多地域文化的序列中别具一格。

(本稿由徐州市社科联推荐)



王健，史学博士，教授。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全国高校历史学一类特色专业首批建设点主持人，江苏省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首席带头人，省 333 跨世纪人才工程首批人选。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徐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徐州市孔子学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中国文化研究，主持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与徐州市 2010—2012 三年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项目等。发表论文 80 余篇，出版专著《中华文明的礼赞与反思》、《中国古代文化史论》、《潜夫论评注》、《中国古代通史·秦汉卷》、《秦帝国史》、《中国通宝币制史稿》等，主编《云龙史学丛书》两种。

